

地方民族主义与肯尼亚多党大选

——以 1992 年和 1997 年肯尼亚多党大选为例

张永蓬

内容提要 肯尼亚大选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因素是由肯尼亚政党的地方民族背景决定的。地方民族主义成为党派利益斗争的工具。政治家或政党往往利用地方民族间的固有矛盾,达到打击对手、获取政治利益的目的。地方民族主义削弱了肯尼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对肯尼亚未来政治的消极影响将是久远的。

关键词 肯尼亚 多党大选 地方民族主义 反对党

肯尼亚的政党一般都有相应的地方民族背景。¹ 从 1991 年 12 月确立多党制以来,肯尼亚已经过了 1992 年和 1997 年两次大选。从大选前反对党的联合与分裂、与竞选有关的暴力冲突到选举过程,都体现了鲜明的族体差异性和地方民族意识,对大选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反对党的力量组合

肯尼亚反对党的力量组合,无论是分散或者聚合,都与地方民族主义有着实质性联系。在反对党组建或联合的阶段,为了赢得广泛的支持,一些组织者往往竭力争取多民族成员的加入,以使自己的党成为民族统一的党。然而,这种努力始终伴随着地方民族意识的影响,其结果则埋下了日后政党分裂的祸根。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基库尤族的政治领导人马蒂巴和卢比亚加入并推动多党制运动时,反对派的联合努力便露出了分裂的端倪。当时,为了增强影响力,马蒂巴和卢比亚采纳了肯尼亚法学会主席穆伊特的建议,决定联合一些著名的、已经脱离莫伊政府的政治家组成推动多党制运动的全国性联盟。这些人包括卢希亚族的领导人马辛德·穆利罗(Masinde Muliro)、马丁·什库库(Martin Shikuku)和卢奥族的领导人奥金加·奥丁加。这种联合显然集中了肯尼亚的 3 个主体民族,如果成为现实,势必对莫伊政府构成巨大威胁。作为加入全国性联盟的条件,马蒂巴和卢比亚建议由肯尼亚资格最老的反对派领导人奥丁加担任反对党的领袖,以重建 20 世纪 60 年代的“基库尤—卢奥—卢希亚族联盟”。然而,就在反对派的力量迅猛发展时,莫伊总统感觉到了一种严重的挑战,于是很快就逮捕了马蒂巴、卢比亚以及莱拉·奥丁加(奥金加·奥丁加的儿子),从而使反对派力量受挫。

1991 年 2 月,奥丁加在指责莫伊政府破坏肯尼亚的民族和睦、并通过广播电台传播战争

¹ 参见拙文:《肯尼亚政党的地方民族主义背景》,载《西亚非洲》,2002 年第 2 期。

和恐怖信息的同时,打着“民主和正义”的旗帜,宣布成立“民族民主党”(NDP)。他宣称,该党将寻求给肯尼亚人“提供一次机会以建立一种解决冲突的制度。这种制度将是开放的、非暴力的、民主的和正义的”。在组织上,他的党将“邀请所有的肯尼亚人参加,无论其来自何方。请他们加入到在肯尼亚建立民主和社会正义的运动中来”。然而,由于马蒂巴、卢比亚的被捕以及奥丁加本人的年龄(近80岁)等不利因素,“这位前肯尼亚人民联盟领导人已经不能吸引强大的支持者队伍”。¹

“恢复民主论坛”(FORD,以下简称“论坛”)的建立与分裂过程集中体现了1992年大选前肯尼亚反对党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论坛”在前一阶段尽可能多地吸收了不同民族和地方的成员。在“论坛”的组建过程中,由于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的参与使其地方代表性大大增加,并基本上做到了每省均有代表。^④1991年12月“论坛”正式登记为政党时,奥丁加任主席,什库库为秘书长,穆利罗任副主席,菲利普·加科卡(Philip Gachoka,基库尤族人)为组织秘书。^⑤

然而,由于族体利益的冲突,反对派组成广泛的民主联盟以便把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以下简称“肯盟”)赶下台的设想未能实现,“论坛”本身却陷入内部争吵之中。^{1/4}更加严重的问题是马蒂巴与奥丁加在总统候选人的争夺中互不相让。卢奥族人认为奥丁加在总统竞选中比马蒂巴更有优势,他可获得卢奥族地区的全部选票,而马蒂巴只能在基库尤族地区与基巴基分享选票。《每周评论》(*The Weekly Review*)指出:“(上述二人)无论谁丢失‘论坛’的总统候选人资格,都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党的分裂。只有这样才能使另一个人寻求总统之梦。”^{1/2}

不可调和的分歧终于导致“论坛”的分裂,结果是马蒂巴与什库库组建“论坛(正统)”,拥有来自中央省(Central Prov.)的马蒂巴的基库尤族支持者和西部省(Western Prov.)的什库库的卢希亚族支持者;原“论坛”剩下的部分称为“论坛(肯尼亚)”,由奥丁加和穆伊特领导,其民族背景为卢奥族。基巴基成立新党“肯尼亚民主党”,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基库尤、恩布、梅鲁和坎巴等族,因而被称为“吉马的复活”。^{1/4}至此,原有的“基库尤—卢奥—卢希亚族联盟”完全破裂。在政党多极化的过程中,反对党参加大选的实力也进一步削弱。

综上所述,反对党领导人追求权力的个人实力是有限的,他们的真正基础是其所依托的地方民族。同时,地方民族主义也是导致反对党力量分散与削弱的根本因素。

二、暴力冲突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因素

肯尼亚各民族间暴力冲突的原因有历史阶段性,在前殖民或殖民时代,主要是经济原因,

¹ David W. Throup & Charles Homsby, *Multi-party Politics in Kenya*, Oxford, 1998, p. 70.

^④ Ibid., pp. 76-79.

^⑤ 参见 *East African Standard*, (Kenya) December 12, 1991.

^{1/4} 参见 Harvey Glickman(ed.),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Press, 1995, p. 181.

^{1/2} *The Weekly Review*, (Kenya) May 8, 1992, p. 5.

^{1/4} *Sunday Nation*, May 31, 1992。“吉马”(Gema)是基库尤、恩布、梅鲁族的一种联合形式,在肯雅塔执政后期发展成为团结三族的强大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解散前达到全盛。当时,与基库尤人在全国利益部门所占的优势比例相适应,“吉马”也演变为具有广泛权力和影响的、具有政党地位的政治组织。它的宗旨是维护基库尤人的团结和利益。“吉马”在肯雅塔政府危机时起过关键作用。与卡伦津的“马吉姆博”一样,“吉马”也是典型的地方民族主义组织。关于“吉马”的情况,可参见: *The Weekly Review*, February 21, 1992, pp. 10-11; Harvey Glickman(ed.),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p. 183.

特别是土地、牲畜等财产引起的纠纷。肯尼亚独立后,民族冲突的原因和性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经济原因逐步过渡到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相结合。如在肯雅塔时期,与卡伦津人达成的政治交易解决了基库尤人的移居问题,由此也引发了两族间的一系列冲突。到莫伊时期,特别是多党制启动前后,政治上升为引发冲突的首要因素,这种冲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政治家或政党往往利用地方民族间的固有矛盾,通过激发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挑起暴力冲突,达到打击对手、获取政治利益的目的。1992、1997年两次大选前后的民族冲突都表现出这种特点。

早在1991年9—11月就发生了以马吉姆博主义¹为先导的地方民族冲突(分别以执政党和反对党为政治背景的卡伦津族和非卡伦津族间的冲突)。到1992年大选前,暴力冲突更加频繁,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非卡伦津族及反对党的力量大大加强,形势趋于复杂化,暴力手段全面升级,其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在1992年2—3月的6周时间里,肯尼亚西部省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至少造成60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莫伊政府和反对党互相指责对方挑起冲突,焦点集中在政治多元化问题上。

1992年4月中旬,在纳库鲁(Nakuru)区的摩罗(Molo)乡,卡伦津人与基库尤人之间再次爆发冲突,并蔓延到内罗毕地区。据逃离摩罗乡的妇女们称,非卡伦津族的儿童们正在遭受“卡伦津族战士”的屠杀。与此同时,卡伦津人也遭到报复性袭击。^④事实上,类似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992年12月大选后方有缓解。

谁挑起1992年大选前的暴力冲突?“肯盟”的嫌疑最大。第一,裂谷省(Rift Valley Prov.)地方民族间的暴力冲突是伴随着多党制的启动而发生和加剧的,这说明多党制与莫伊本人及“肯盟”的利益是对立的,前者是对后者政治利益的严重威胁。莫伊领导的“肯盟”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多党制。面对反对派的压力,“肯盟”及卡伦津族的政治精英们积极发动了反击,马吉姆博主义下的暴力正是其表现形式。第二,在对1992年4—5月间的民族冲突进行报道的5家权威媒体(包括肯尼亚国家基督教理事会“NCCK”、《民族日报》、美国纽约的《非洲观察》等)中,有4家均持有如下观点:裂谷省的民族冲突与多党制争论以及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煽动暴力有直接关系。有证据表明,暴力分子主要是“卡伦津战士”,执政党和莫伊政府中的一些著名成员给暴力分子提供了弹药、运输、食品和住宿条件,政府安全机关特别是警察对暴力冲突熟视无睹。^⑤第三,冲突发生后,莫伊政府及“肯盟”领导人言行不一,未能积极阻止事态扩大或制止骚乱。1992年4月的冲突发生后,在反对党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莫伊政府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已经给安全部队发出强硬指示,要求公正地处理当前形势,并以必要措施维持法律和秩序。任何卷入部落冲突、焚烧房屋、抢劫牲畜、非法设置路障以及参与其他违法活动、威胁他人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个人和集团都将受到坚决果断的处理。”但实际上,莫伊政府宣称已逮捕的几百名(警方称800人)与暴力事件有关的人员,最终没有一人受到法律的指控。^¼第四,激发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与“肯盟”及卡伦津政治家的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在1992年大选前夕,“肯盟”对于能否胜选并无把握,反而感到了反对党的强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肯盟”领导人在南迪区的几次集会上进行鼓动,加上马吉姆博主义的出笼,卡伦津人的地

¹ “马吉姆博”是20世纪60年代肯雅塔执政时,卡伦津等小族体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制衡基库尤、卢奥等大族的一种“联邦”。到莫伊时期,由于既得利益,组织形式已趋于淡化,但作为政治意识却始终存在。

^④ 参见 *Sunday Nation*, (Kenya) May 1, 1992, pp. 10-11。

^⑤ 参见 Harvey Glickma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pp. 178-179。

^¼ 参见 *The Weekly Review*, May 1, 1992, pp. 9-12。

方民族主义情绪被完全激活,再联系到传统的土地问题,在政府的默许下,暴力冲突很容易就发生了。对于“肯盟”的卡伦津政治家而言,裂谷省的地方民族主义不仅能使莫伊和比沃特摆脱因腐败问题而遭受的诘难,更重要的是能保住政权、保住卡伦津人的既得利益,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1997 年大选前夕,由于反对党力量分散,“肯盟”获胜较有把握,选举前的地方民族关系远比 1992 年大选前宽松。不过,在沿海的蒙巴萨地区还是发生了袭击外来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反对党将此事件与大选联系起来。因为早在 1992 年的大选中,根据肯尼亚的宪法,在任总统莫伊必须在全国 8 个省(市)中的 5 个省至少得到 25% 的选票,才能避免第二轮投票,而当时“肯盟”在利科尼(沿海地区)进行的一次补选中失败,据说,这主要是由于从内地去的居民参与选举所起的作用。作为外来少数民族,这些居民普遍具有反对政府的倾向。因此,为确保 1997 年大选的选票,“肯盟”的政治家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导演并参与了仇视和驱赶少数民族(主要是穆斯林)的地方民族主义行动。在首都内罗毕的一次天主教弥撒活动中,主教们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这些冲突是“那些暴虐狂的政治家的果实,他们从某些少数民族的不在场或不参加选举中获得好处”。同时,主教们还诘问:“这是不是达到 25% 的又一种方法?”¹

1998 年 1 月,裂谷省的莱基皮亚(Laikipia)和纳库鲁地区再次爆发民族冲突。《每周评论》的文章指出:“很清楚,暴力分子的目标是在裂谷省的基库尤农民中制造恐慌,以使他们逃到中央省的安全地带……事实显示,裂谷省的未来将构成向莫伊后时代过渡的主要障碍。”^④这可解释为,只要裂谷省卡伦津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地方民族主义的暴力就将持续下去。

综合 1992 年和 1997 年肯尼亚大选前后的地方民族冲突,尽管有时对立双方推卸责任、各陈其理,以致是非难辨,但从冲突的实例来分析,有 3 条主线是十分清晰的:一是几乎所有的冲突都在卡伦津族与非卡伦津族之间展开;二是冲突双方在政治上的代表分别是以卡伦津族为背景的“肯盟”政府和以非卡伦津族为背景的反对党;三是围绕冲突的地方民族主义争吵要比冲突本身影响更大,政治冲突已被赋予地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甚至激发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选举战略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因素

从两次大选来看,与反对党相比,“肯盟”的战略是灵活、现实的。在 1992 年大选前,一方面,“肯盟”打出了“稳定、进步”的选举口号,通过自己掌握的广播、电视等宣传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反复宣传,并特别强调:多党政治将引起民族对立与暴力,提醒肯尼亚人民慎重选择,“以保证国家不会变成另一个索马里”(当时索马里正处于内战中)。莫伊在公开场合也总是强调各民族的团结与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在卡伦津地区等“肯盟”的传统势力范围内,“肯盟”领导人却又鼓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指责反对党为“部落主义者”或“部落俱乐部”,说反对党将把较小的部落推进“政治垃圾箱”。在莫伊视察裂谷省的埃尔贡(Elgon)山区时,随行的一位部长向人群发表讲话说,大的部落已经组成反对党以便“吞掉像卡伦津和萨伯特这样的小部落”。“肯

¹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7 年 9 月 22 日报道:《肯尼亚沿海省份发生严重骚乱》。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7 年 10 月 4 日。

^④ The Weekly Review, January 30, 1998, pp. 4-6.

盟”党报《肯尼亚时代》也发表文章指责肯尼亚民主党是伪装起来的“吉马”，暗示肯尼亚最成功的资本家、“吉马”前总裁尼恩加·卡卢姆(Njenga Karume)是民主党真正的领导人。“肯盟”还竭力夸大基库尤人的威胁，称反对党的胜利就意味着马赛、卡伦津等小族体的土地将被基库尤族居民夺走。另外，“肯盟”还利用一切机会挑起基库尤、卢奥两族之间的宿怨，激发双方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在民族冲突与暴力问题上，受到各方指责的“肯盟”始终予以反击，指责反对党是“只对挑起内战感兴趣的部落党”。¹

应当说，所有这些鼓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地方民族关系非常复杂的肯尼亚，众多的小族体向来对基库尤人等大族体怀有戒心和不满。大选前，除“肯盟”外，主要的反对党“论坛(肯尼亚)”、“论坛(正统)”和肯尼亚民主党的族体代表性都很差，这就为“肯盟”攻击对手提供了口实，为其联合诸多小族体、塑造全民党的形象创造了条件。相比之下，反对党的竞选战略表现出“大而全”的特点，如涉及到执政党的腐败、国家经济状况、人权等等，却未突出重点。地方民族冲突问题自然是反对党借用的重要武器，但其现实结果极可能对“肯盟”有利。因为，在一些选民举棋不定的选区，“肯盟”保证选票的重要手段就是暴力，反对党对“肯盟”煽动暴力的渲染往往使选民更加惧怕若不给执政党投票，将给他们的族体造成严重后果。反对党的更大失误还在于各派领导人的自私性与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观念。他们各自为政，推出了7位总统候选人。本来基库尤族的选民最多，但基巴基与马蒂巴却分别以两个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参选。

1997年大选前，“肯盟”使用了几乎与1992年相同的竞选战略。在选举投票日，莫伊最后呼吁反对暴力，反对带着部落意识投票。他提醒裂谷省的多民族共同体，在影响到他们财富的问题上应该用一个声音说话，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并要求他们投票给“肯盟”，因为它是代表所有共同体利益的党。^④另一方面，在稳定已掌握的选区的同时，“肯盟”继续在地方民族主义问题上做文章，首先是在滨海省(Coast Prov.)等地区加强暴力威胁，以达到在这些地区能获得足够选票的目的；其次是加强攻击反对党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四)

在反对党方面，1997年大选战略有进步的是基库尤族。基巴基在公开场合竭力避免谈到基库尤族联合体，“不声不响”地将基库尤人团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马蒂巴的退出实现了基库尤族统一候选人的愿望。基库尤族选民兴奋地说：“我们曾经误使人们相信基库尤共同体是分裂的，但我们一直就知道基巴基是我们唯一的总统候选人。”^{1/4}不过从总体上看，自1992年以来，反对党之间的分裂日益加深，未能产生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仍然是反对党的最大劣势。当然，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还是各政党的地方民族主义意识。比如，1997年大选前莱拉·奥丁加指责瓦马尔瓦(Wamalwa，“论坛(肯尼亚)”的成员)和什库库(二人同为卢希亚族)是“肯盟”在反对党内的“鼯鼠”。他认为，现在国家的局面是他和马蒂巴、卢比亚开创的。他说：“当我被监禁时，那些别的反对党竞争者在哪儿？”而马蒂巴则指责基巴基忘恩负义(指基巴基不顾马蒂巴帮助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从而在马蒂巴影响力较大的姆兰加(Murang'a)地区造成对基

¹ David W. Throup & Charles Homsby, *Multi-party Politics in Kenya*, pp. 340-343.

^④ 参见 *East African Standard*, December 29, 1997.

^(四) 例如，在1997年12月中旬，当自由党人旺加里·马阿太(Wangari Maathai)召集基库尤、恩布、梅鲁(传统的“吉马”)三族召开会议以协调推出统一的总统候选人时，“肯盟”秘书长立即抓住把柄，指责此会是危险的、倒退的、部落性质的会议，它将把部落主义引入肯尼亚政治，与前辈自由战士和建国之父们的愿望相违背。参见 *East African Standard*, December 16, 1997.

^{1/4} *The Weekly Review*, January 9, 1998, p. 11.

巴基的选举不利。¹ 卢希亚人则似乎选择了与“肯盟”联合的捷径,以便能从莫伊手中夺取权力。他们说:“我们已经支持了卡伦津人多年,现在是卡伦津人支持我们的时候了。”^④

两次大选前各方的选举战略及暴露的问题表明,地方民族主义是大选中不可避免的内容,它似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威胁对手,用不好则伤及自身。1997 年大选结果表明,如果反对党不存在太多的民族基础上的分歧,基巴基极有可能胜出。地方民族主义对两次大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大选结果: 地方民族主义的集中展示

1992 年 12 月和 1997 年 12 月肯尼亚两次多党大选的结果,以其最直观的形式充分展示了地方民族主义在肯尼亚多党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其特点是: 总统和议会选举都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民族性,政党的地方民族主义背景在选民的投票倾向中得到充分展示。正如《每周评论》所言:“民族政治将最终决定总统大选的结果”。^(四)

首先以 1992 年大选为例。参加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有 8 位,他们是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恢复民主论坛(肯尼亚)的奥金加·奥丁加,恢复民主论坛(正统)的肯尼斯·马蒂巴,肯尼亚民主党的姆瓦伊·基巴基,肯尼亚民族民主联盟(KENDA)的穆卡鲁·恩加恩加(Mukaru Nga’ nga),肯尼亚民族大会(KNC)的契布瓦·苏马(Chibule Wa Tsma),肯尼亚独立候选人党(PICK)的约翰·哈伦·姆瓦(John Harun Mwau),肯尼亚社会大会的乔治·安尼奥那(Georbe Anyona)。大选结果是: 莫伊取得全国 36.4% 的选票,马蒂巴为 25.6%,奥丁加为 19.6%,基巴基为 17.1%。莫伊以多出紧随其后的马蒂巴近 60 万张选票而当选为总统。^¼ 以地方民族为背景的各候选人(这里仅以前 4 位为例)在全国 8 个省市的得票率如下(单位: %):

省份	莫伊 — “肯盟”	马蒂巴 — “论坛(正统)”	奥丁加 — “论坛(肯尼亚)”	基巴基 — 肯尼亚民主党	投票率
内罗毕市	16	44	20	18	56
滨海省	62	11	14	10	48
东北省	72	11	8	5	51
中央省	2	60	1	35	86
东部省	37	10	2	50	65
裂谷省	71	16	5	7	76
西部省	39	38	17	2	61
尼安萨省	15	1	75	6	67
得票总数	1927640	1354856	1035507	903886	66%

资料来源: *The Weekly Review*, January 1, 1993。

¹ 参见 *East African Standard*, December 16, 26, 1997。

^④ *Ibid.*, December 20, 1997。

^(四) *The Weekly Review*, January 1, 1993, p. 3。

^¼ 参见 *The Weekly Review*, January 22, 1993。

从此表看, 马蒂巴的选票主要来自中央省和内罗毕地区, 这是基库尤人的传统聚居地。奥丁加的选票最为集中, 除在其家乡尼安萨省占有绝对优势外, 在其他省份的得票率明显偏低。基巴基的支持率从总体上看偏低, 但地方民族性也很明显, 在基库尤人集中的中央省和内罗毕地区对他的支持率也分别达到 35% 和 18%。莫伊的支持票主要来自滨海省、东北省、裂谷省, 在东部省和西部省也得到相当大比例的选票。支持“肯盟”的选票分布与大选前“肯盟”的战略行动是一致的。从得票最多的东北省和滨海省来看, 其居民大多为少数民族。

如前所述, 少数民族在选择盟友方面往往倾向于“肯盟”, 再加上大选前“肯盟”通过策动、纵容地方暴力排除了很多对己不利的因素, 以及正确的宣传战略, “肯盟”的获胜当在意料之中。裂谷省本来就是莫伊的家乡, 其获胜自然是靠卡伦津人的全力支持。莫伊及“肯盟”所获选票最集中的是裂谷省中部的 5 个区, 当地的居民几乎全是卡伦津族, 该地区的选票也几乎都投给莫伊。当然, 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其他的因素: 其一, 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 作为莫伊及“肯盟”的传统势力范围, 在选举前被灌输了更多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当地大多数居民由于文化水平低、交通通讯工具缺乏等原因, 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反对党”, 更不知其领导人是谁, 只知道莫伊和“肯盟”。其二, “肯盟”有可能在选举中做了手脚。据有关资料, 1992 年大选时, 这些地区的选民是在穿制服的酋长的监督下进行选举的, “投反对票的人将面临死亡的威胁”, 而在一些投票站的投票率甚至高于 100%,¹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1997 年大选的“投票格局在大多数地区简直就是 1992 年大选的翻版”。^④反对党各方按照地方民族划线, 未能推出唯一的候选人。尽管基巴基成为基库尤族唯一的候选人, 但其影响力及代表性仍基本上局限于基库尤族,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支持率。1997 年各政党总统候选人在各省的得票情况如下(以得票最多的前 3 位为例; 单位: %):

省份 候选人	内罗毕	滨海省	东北省	东部省	中央省	裂谷省	西部省	尼安 萨省
丹 尼 尔·阿·莫 伊—“肯盟”	20.56	61.05	73.08	35.87	5.59	69.38	44.67	23.52
姆瓦伊·基 巴基—肯尼 亚民主党	43.74	13.47	18.60	28.81	88.73	20.9	1.38	15.05
莱拉·奥丁 加—民族 发展党	16.23	6.07	0.33	0.75	0.68	2.19	1.91	56.55

资料来源: *The Weekly Review*, January 9, 1998。

从上表可以看出, 1997 年大选中“肯盟”候选人莫伊仍然保持了 1992 年在滨海、东北、裂谷、西部等省的优势, 在内罗毕与中央省的得票还略有上升。支持基巴基的选票仍然集中在中央省和内罗毕地区。支持莱拉·奥丁加的选票基本上集中在卢奥族聚居的尼亚萨省。

从两次总统大选的结果来看, 肯尼亚地方民族主义对多党政治的影响是直接的, 大选被建立在地方民族的基础上。美国学者哈维·格利克曼(Harvey Glickman) 指出:“非洲的政治仍然被

¹ 参见 David W.Throup & Charles Homsby, *Multi-party Politics in Kenya*, p. 465。
^④ *The Weekly Review*, January 9, 1998, p. 3.

民族冲突严重分割开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由通向民主的开放所提供的政治空间仍然是一个竞技场,在那里,政策的争论与民族力量、民族政党和在民族基础上获得支持的候选人之间展开不平等竞争。”¹这也正是肯尼亚的现实。在这里,在多党制条件下,各民族力量、政党以及候选人以地方民族主义的形式参与政治。“基本的部落和族体分布对肯尼亚的选举地理施加了根本性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对整个国家的议会选区和行政机器的决定权。”^④这一点,可以从执政的“肯盟”对大选的影响中看到。

地方民族主义对肯尼亚未来政治的消极影响将是久远的,很可能不是一两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吉图·姆伊盖指出:“曾对改变肯尼亚政治规则表现出坚定信念的年轻一代政治家正在对有关原则问题的民主争论变得绝望,并且正在探索民族动员的游戏。”^④

地方民族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将严重动摇肯尼亚多党政治的社会基础,使其始终处于脆弱的状态。正如一位肯尼亚政治评论家所指出的,部落主义在肯尼亚的强势存在直接导致不断的民族冲突,“也播下民族沙文主义、民族仇恨的种子和难以消弭的不信任,这对国家的融合与团结是有害的”。^¼随着2002年大选的临近,肯尼亚的地方民族主义值得关注。

Abstract In Kenya, the factor of local nationalism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local-ethnic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local nationalism has become a tool in the struggle for party interests. Usually, politicians or political parties will make use of the existing local-ethnic contradictions for the purpose to defeat the rivals and win their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Local nationalism has weakene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will exercise a far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politics in Kenya.

(张永蓬,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100007)

〔责任编辑:蔡曼华〕

¹ Timothy D. Sisk and Andrew Reynolds (eds.), *Election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1998, p.37.

④ Roddy Fox, “Bleak Future for Multi-party Elections in Kenya”,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4, 4(1996), p. 597.

④ Harvey Glickman(ed.),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p. 193.

¼ *The Weekly Review*, February 27, 1998, p. 16.